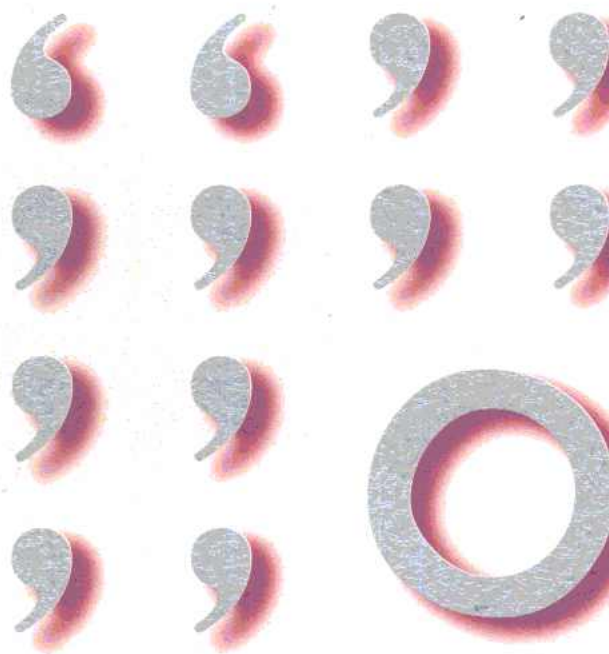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幻化』 评论集

CHANG PIAN XIAO SHUO
HUA HUA
PING LUN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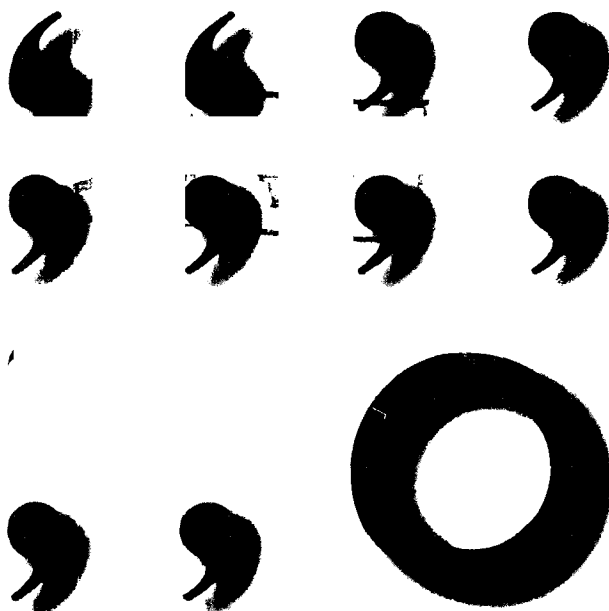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幻化』
评论集

2207.425

H35

CHANG PIAN XIAO SHUO
HUA HUA
PING LUN JI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何西来等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7

ISBN 7-02-003494-2

I. 长… II. 何… III. 长篇小说-文学评论-
中国-当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345 号

责任编辑: 刘海虹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

Chang Pian Xiao Shuo 《Huan Hua》 Ping Lun Ji

何西来 等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02-003494-2/B. 218

定价 20.00 元

对传统审美观念的冲击

——读《幻化》

牛玉秋

阅读《幻化》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它那一百多万字的巨大篇幅；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以一种特异的审美态度叙事，形成了对传统审美观念全面的挑战和冲击，从而使阅读时时处于不顺畅之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要求，倾向应该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该由作者特别指点出来，议论应该为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服务。而在《幻化》中，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夹杂了大量的议论。这其中有和人物情节有关的，也有和人物情节关系不大的，还有游离于人物和情节之外的。看起来作者是有意识要把这些议论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扩大小说的艺术表现力。由此推断，作者显然自认为这些议论是正确而且深刻的。不过实际上，小说中的议论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既有深刻的，也有肤浅的；甚至还有明显的常识性错误。

传统的现实主义要求人物的行动应该有合理的心理依据和性格逻辑。而在《幻化》中，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常常成了作者主观意念的传声筒。霍士斌在第一部中还只是个虽有缺点、但基本上还算正直善良的好人，在第二部中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坏人；何人杰历史上劣迹斑斑，“文化大革命”中又充当“四人帮”的爪牙做尽坏事，却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华馨薇与何

人杰的关系,本来是一方提供权势庇护、另一方提供色相服务的互相利用的关系,毫无美感可言,作者却也能把这一关系往高尚圣洁上写。凡此种种,如果以传统的审美观念对待,就会感到难以被说服、被感动。然而如果循得作者的思路,就能够找到其中的缘由。

其缘由就在于作者消解了传统美学中真善美同假恶丑的对立。在传统美学中,真善美同假恶丑的对立是最基本概念,作家按照这种概念决定对其人物的感情态度,并以此影响读者的感情态度。而《幻化》的作者却认为,人性本来是善恶杂陈,只有经过知识和智慧的浇灌,经过沧桑浮沉的开采和探寻,人性的珍宝才能被唤醒、被磨亮。用华馨薇的话说,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从走出家门那一刻起,就高唱着《国际歌》……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懂得这首歌词的真实内涵!他们虽然在军衔或官职的阶梯上,占据了千百人终生都无法企及的台阶,但精神世界几近荒芜干涸。人格、道德、友谊、爱情这些人类精神之花,并没有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开放。他们的一生几乎都纠缠在对权力、地位、金钱、妇人无穷尽的欲望之中。在官场倾轧中,他们或彼此撕咬,或明哲保身,根本不顾昔日的战斗情谊;在对女人的追逐中,他们或利用权势威逼利诱,或干脆用暴力强奸,很少有感情的参与。他们虽然经常振振有词、道貌岸然地互相批评指责,但基本上都是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正因为如此,他们无论得势失势,都难以获得读者的同情。这恐怕也正是作者原本希望得到的读者反应。

在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二元对立以后,人性的丰富性的展现便有了广阔的空间。比如那个小爬虫式的人物郭戈就摆脱了类型化的模式,在被押后并没有服软求饶,既不检举揭发,也不搪塞推卸,很有点儿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侠义之风。再加上此

人虽然有罪恶,但罪不当诛,所以他的死,竟然也使人感到隐隐有些不舒服。此外,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的交互作用也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霍士斌的勇猛冲动、何人杰的富于心计、黎可夫的调和中庸固然基本上划定了他们人生旅程的大致走向,但几十年宦海沉浮,又何尝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性格。霍士斌心计见长,何人杰时见刚强,黎可夫绵里藏针。命运沉浮的巨手迫使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世界。他们在顺境和逆境中常常会有两副面孔,有时甚至会有两种见解,比如霍士斌平反前后对老折头的态度,何人杰罢官前后对人生的认识。

《幻化》在审美态度上的上述变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些混乱,但主要还是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是值得肯定的艺术探索。作者在尝试新的艺术手段时,并没有清除干净旧的、传统的艺术手法的影响。所以,传统观实主义的手法在这部作品中还时有所见。这就使得读者不能顺利地进入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也就不能不使读者时时要用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这部作品。这就是产生阅读障碍的根本原因,也是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内在矛盾。

(2000年8月28日《羊城晚报》)

红色生涯的别一种探照

——读张俊彪的长篇三部曲《幻化》

古 耜

—

若干年前，曾零星读过作家张俊彪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作品，当时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有幸与同一位作家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幻化》相遇，一种贯穿和充盈于字里行间的强烈而大胆的艺术探索精神，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一连许多天，我总是一边追寻着、感受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沉浮与心灵视景，一边辨识着、咀嚼着如此命运与心灵轨迹中包含的社会、历史、思想和人性元素，及至最终读完这部洋洋洒洒一百四十五万言的长篇作品，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则是这样的自问：作家在他潜心构筑的繁纷的形象系列和阔大的艺术时空中，究竟寄寓了怎样的精神意向与价值判断？把寄寓了如此精神意向和价值判断的形象系列与艺术时空，放在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宏观背景之下，又有着怎样的拓新和建设意义？而当我遵循老祖宗所谓“以意逆志”的思路，力图通过对审美形象和阅读印象的梳理，来尝试着回答上述问题时，作为“内容说明”印在作品封面上的那段话，再次映入了眼帘：“动荡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演绎出了丰富的人生。三个农村孩子，本世初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人民战争，历尽艰辛，创立了共和国，成了省委书记，又伴随着

共和国走到了改革开放的90年代。纷繁的人物和事件交织出一个世纪的民族的史诗。”不知道这段文学出自谁手笔,只是在我看来,它不仅大致准确地勾勒出通部《幻化》的基本故事情节,而且在准确的故事情节的概括中,很自然地传递出作家两方面的创作取向:一、全书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着重写了三个人物的人生历程,而这三个人物的人生历程并非仅有个体的生命意义,而是在此基础上尽量表现世纪风云的某些景观。二、全书着力描写的三个人物不是历史长河里的芸芸众生,而是20世纪震撼中国大地的革命潮流的先行者、中坚者和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人生经历便不是普普通通的民间悲欢与人际恩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为数不少的老一代职业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或者说是一种红色生涯的艺术浓缩。

毋庸讳言,在长篇小说里塑造革命人物和表现革命历史,并非属张俊彪的独创,相反它曾是半个多世纪来红色文学的传统性、经典性内容。然而,正如丰富的创作实践所揭示的:文学作品的出新有时不在于作家写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写,高明的作家常能在司空见惯的题材中,写出自己特有的东西,从而获得陌生化效果。一部《幻化》恰恰是在这一层面,开始了从思想到艺术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作家立足于独异的视角,以全新的目光,对老一代革命者展开了迥异于他人、也迥异于传统的打量与思索,同时伴之以相当个性化的、别开生面的篇章结构、艺术手法和叙述语言。这时,通部作品构成了对红色生涯的别一种探照,而此种创意盎然的艺术探照又反过来为作品的立足文坛,提供了极充足的理由和依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长篇小说塑造革命者形象，似乎只有一种思路、一种模式，这就是：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用一种仰视性和抒情性的语言，热情讴歌主人公不同凡响的英雄行为与崇高思想，由此树立起体现了既定理念的精神偶像，并最终为明确的政治导向服务。这样写成的艺术形象虽然突出了革命者固有的某种本质特征，但同时也因为自觉或不自觉的人性过滤与性格提纯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身应有的丰富性、深邃性乃至真实性。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坛思想的解放和气氛的宽松，一些机敏而勇敢的作家，开始冲破僵硬的模式，力求在探索中写出富有新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但由于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这种探索迄今还大致停留于情感、道德和人性的范围内，面对于他们灵魂和生命中一些更为根本、更为隐秘、也更富有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东西，则依然或熟视无睹，或讳莫如深。正是从如此背景出发，我们来看《幻化》，即可发现：它所倾力塑造的三位职业革命者的形象，分明呈现出以往同类人物颇为鲜见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形态，以致使读者禁不住做细细的观察与回味。

作为全书头号主人公的霍士斌，出身于一贫如洗且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在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历尽艰险，出生入死，凭借屡建的战功而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省委书记。后来，由于党内由来已久的宗派斗争和极“左”思潮的打击，他蒙受冤屈十多年。历史进入新时期后，他平反复出，重新主持省委工作……纵观霍士斌的一生，尽管不乏英勇善战、嫉恶如仇、热情进取、敢

作敢为的光彩纪录，但与这些光彩纪录同在的还有始终无法改变的深层的人性痼疾，这就是：对权力、名望、异性近乎病态的占有欲，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狭隘、虚荣、冷酷乃至卑劣、残忍等等。所有这些渗透了封建主义毒汁的东西，使他最终无法进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的人格境界，而只能扮演一种正邪两赋、善恶交织的角色。与霍士斌相比，黎可夫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出身贫苦农家，早年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的洗礼中成长为我军将领，建国后位列一省主要领导。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多表现为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具体来说便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黎可夫不像霍士斌那样，总是天马行空，激流勇进，大刀阔斧，锋芒毕露，而是在洞悉善恶是非，不泯良知天性的前提下，每每奉行着中庸、调和与自保。此种呈退守状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随着和平环境中党内斗争的日趋激烈复杂，也随着主人公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越来越占据生命的上风，并逐渐同佛家的“出世”和老庄的“无为”融合在一起，它们最终构成了黎可夫晚年的精神基调与心灵归宿。相对于霍士斌和黎可夫，何人杰身上浮现了另一种生命形态与轨迹：他出身富裕人家，仅仅是为了抗拒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参加了红军。大约与生性软弱有关，他在战场上常常胆怯，而在情场上却屡屡得手，为此，他虽然靠投机讨好而官运亨通，却终究算不上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亦成为省级干部。这时，他人性中自私、卑劣和丑恶的东西进一步膨胀，并借助越演越烈的党内斗争释放了出来，其结果便是配合高层的宗派和极“左”力量，罗织罪名，打倒了霍士斌，挤跑了黎可夫，自己掌握了一省大权，继而在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上倒行逆施十多年……此后，随着历史的巨大转折和政治的拨乱反正，何人杰失去了手中的权力，变成了被审查、批判和放逐的对象。在

家乡的山野里，他身听寺庙的钟声，眼观自然的美景，手挽着昔日的情人，心灵中善的一面慢慢恢复，于是，他开始结善缘，做善事，进而把生命留驻在了并列着佛祖和上帝的宗教天国里。

显而易见，如此这般具备了灵魂深度的人物描写，是弥漫着强烈悲剧味的：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都是职业革命家，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他们却始终不曾成为真正的、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而是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或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而从根本上偏离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共产党人的宗旨，或由于种种动荡、挫折和反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最初的政治理想和科学信仰。应当承认，作家的此一番笔墨相当大胆，相当犀利，是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所鲜见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部《幻化》塑造出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这样充盈着悲剧意味的革命者形象，在作家那里，既不是为出新而出新，更不是要怀疑或消解革命理想与信仰本身，而是旨在透过人物的生命足迹和心路历程，去触摸，探照和揭示一种更为深邃，也更为隐秘的历史本相，从而传递自己相当独特的、纵横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思考。顺着这样的思路重读作品，我们即可发现人物身上更为内在的悲剧因素：霍、黎、何三人都出身于农民，参加革命前虽然读过几天书，但基本不出子曰书云，而很少接触当时的新思想、新观点，更不曾认识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与其说是自觉地追求民族的解放，毋宁说是坚决反抗压迫了自己的黑暗现实。这当中改变生存与命运的诱因大超过了革命理想与信仰的驱动。即使后来他们都走上了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岗位，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知之甚少：霍士斌只是在逆境中囫囵吞枣地读过一点儿《资本论》；黎可夫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恐怕也仅仅停留在

常识性的普及读本的水平上；至于何人杰，更是由于长期热衷于宗派活动和政治钻营，而从思想感情上疏远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这些都无形中导致了三个人身上的致命缺欠：身为共产党人，却并不真正懂得共产主义的真谛和要义；手持马列主义的旗帜，却未能从根本上搞清楚马列主义的灵魂和精髓。他们参加革命靠的是朴素的感情，为的是切身的利害；他们名为革命者，实际上依然是农民。正因为如此，在半个多世纪错综复杂而又风浪迭起的革命历史进程中，他们三人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也难以战胜来自历史、命运和欲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或人格向另外的方向幻化，已经近乎必然，无须大惊小怪。

应当承认，《幻化》所倾力描写的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的艺术形象，绝不是作家面壁虚构、主观臆造的结果。相反，他们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特别是近百年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实践之中，是对上述心灵和历史视景深层次而又陌生化的形象揭示。首先，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大约同华夏文化一向注重心灵与外界的和谐统一，以及儒家学说更强调现实社会的神圣性相关。长期以来，国人在普遍的价值取向上，并不怎么特别看重彼岸世界、未来人生，而是更关心当下的、世俗的生存与发展。这样一种生命立足点，固然激励着人们丢掉幻想，脚踏实地，积极入世，勤奋劳作，但同时也使一些人只注重眼前的利害和实际的得失，而相对看轻了精神信仰和心灵建设对于人的意义。霍士斌等三人的生命悲剧恰恰披蒙上了其中的负面色彩。他们一生都在尘世间奔走、忙碌和拼搏，也做过许许多多至少在客观上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但是，这种奔走、忙碌和拼搏，却始终缺乏一种从心灵深处自觉认同的高起点、高层次的精神信仰做导引，缺乏一种对人类的终极关爱。因此，他们很容易在现实生活的欲望放纵和利益追逐中扭曲自我，进而扭曲他人、

扭曲社会。而何人杰晚年的皈依宗教,则又从物极必反的角度昭示着灵魂虚空、信仰缺席的结果,其中留给人们的思索是绵绵不尽的。显然,如此这般的艺术形象,深深寄寓了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缺憾一面的清醒认识,以及站在时代的高度,要求改变和扬弃传统文化心理的热切呼唤。其次,从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来看: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它的革命队伍中自然而然地包括了大量的农民成分。而以自足经济为突出特征的农民要承担起革命任务,进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自我学习、改造和提高的,缺少了这一条,他们不但很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且还极容易因为自身固有的弱点而造成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阻滞乃至伤害。在这一方面,历史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教训,而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作为三个艺术形象,同样具有重要的鉴照和警示意义。他们仿佛面对读者,在现身说法: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都应当坚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都应当不断清除自身肌体内那些狭隘的、落后的和腐朽的东西,努力保持一种清洁的、健康的精神。否则,历史和生命的悲剧将会不断重演。而这庶几是作家塑造笔下人物的苦心所在。

三

大量的文学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部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探索性小说而言,其作家的探索精神,大都不会仅仅体现在对人物形象历史含量的深入发掘和精神风貌的全新把握上,而是常常在此基础上,从人物塑造的需要和特点出发,同时设计和选择一系列既与之相协调相适应,又充盈着艺术开拓精神和冒

险意味的表现手法、审美范式。这时,创意盎然的审美和艺术表现因素,不仅把人物身上的种种新质更富魅力地传达了出来,而且还使通部作品平添了一种高蹈不羁的整体审美风格。一部《幻化》正可作如是观。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围绕着另一种革命者形象的塑造所进行的小说审美意识和表现手法上的探索与革新,同样是大胆的、明显的、成功的。其令人激赏之处至少可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一部长达一百数十万言的长篇巨制,《幻化》固然以展示霍士斌等三位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为基本线索,但是,作家在将这条基本线索转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时,却没有让自己的笔墨孤立起来、封闭起来,而是立足于主线的延伸和主题的深化,同时让艺术笔墨尽量斜出旁溢、多向辐射,力求使作品拥有更为开阔、更为繁复、也更具认识价值的社会历史场景和内涵。譬如:作家在描写霍士斌等三人的戎马生涯时,便有意地腾出较大的空间,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大西北革命战争的刀光剑影、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以及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进行了浓墨重彩,这使得读者一下子感受到了20世纪上半叶西北大地特有的历史氛围与地域神采。同样,在描写霍士斌与金山工程的历史一幕时,作家也放出雄健而又传神的笔力,生动而准确地再现了我国大跃进前后的工业场景和社会气氛,从而引导人们冷静而深入地回味过去,认识历史。还有围绕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三人解放后权力更迭所展开的宏大叙事,经过作家的巧妙调度与生发,也不仅仅具有个体和本体意义,而是同时构成了“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风景。它有些知人论世、由人及史的意味。至于出现于霍士斌晚年的霍婵娟、梅静亚的不法经商、弄权寻租,沈雨佳的为非作歹、官运亨通,以及孟飞、陈月英、水中星等人的种种表演,则在无形中交织成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的

斑驳世相,披露出社会前进的坎坷与艰难。显然,凡此种艺术描写,几乎浓缩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流变、人间沧桑。从这一意义讲,说《幻化》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史诗的品格,或许并非溢美夸饰之词。

第二,在《幻化》中,塑造人物形象虽然依旧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但是,作家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已不像通常的小说作品那样,刻意追求生动曲折、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与矛盾冲突,甚至也不着力突出和强化人物的典型性格,而是将笔触由表及里地伸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用敏锐、细腻的艺术语言,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来捕捉和表现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错综复杂、微妙多变的心理活动。这时,由于作家的抒写严格恪守着心理现实主义的原则,所以其笔下呈显的心灵视景,便每每保持着同生命现实一样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多面性。以霍士斌为例,他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可以牢记着杀敌报仇、解放穷人的理念,但是在面对漂亮可人的女性时,却总也抑制不住动物属性的发作;他在身处逆境时念念不忘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乡里乡亲,然而一旦官复原位却从内心里厌烦登门探访的昔日恩人;他的自觉的意识层面或许不无为人民服务的信条,但在潜意识里却总是把自己当成一方民众的救世主。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何人杰的心灵屏幕上。他当年热衷于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时,可谓奸猾而残忍,但晚年面对清风明月,却平生出菩萨般慈悲情怀。还有两度担当省内“第一夫人”的梅静亚,她在改嫁霍士斌后,既具有命运改变、东山再起的喜悦,又不无愧对子女乃至前夫的抑郁;既每见夫贵妻荣的骄矜与自得,又潜存身体老朽的委屈和怨怼,其内心世界是矛盾的,但又最终统一于她自私而虚荣的主导性情。应当承认:如此这般的心理描写,把人物内心深处那些极复杂、极隐秘也极动荡不定的东西,都清晰充分地袒露出来了;而具备了如此

心灵广度和深度的人物形象,无疑是立体的、厚重的、真实的。他们也许缺乏某种外在的戏剧性和观赏性,但却经得起人们多方面的久久审视和细细咀嚼。

第三,与着重拓展和显示人物心理空间的艺术取向相联系,一部《幻化》在时空调度与结构安排上,毅然放弃了传统小说通常惯用的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从头道来的手法,而是大胆选择了西方现代派小说每每采取的依据人物心理时间来组合时空、完成叙事的方式。这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横向借鉴,不仅有效地强化了整个作品的现代审美风格,而且从艺术效果的角度看,亦堪称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另有一番审美表现力和感染力。譬如:全书第一部《尘世间》,讲述了自1930年至1979年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历史事件,其中包括霍、黎、何三人投身西北工农革命的曲折经历,霍士斌在全国解放后主抓金山工程的种种情形,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在作家笔下,都不是顺着自然时序的娓娓道来,而是被十分灵巧地镶嵌到了头号主人公霍士斌的心理流程中,即通过他在1979年三度旧地重游时的心灵回忆与独白,把当年亲历的历史景象加以穿插跳跃式的再现。这样一种艺术建构方式,不仅使历史回溯因为人物视角的加入而更具有现场感、真实感,而且把相当丰赡的内容合理注入了有限的艺术空间,从而保证了叙事的凝炼、紧凑和摇曳起伏。与《尘世间》相比,作品的第二部《日环食》在时空处理上更见匠心和功力。该卷着重描写恢复了职务的霍士斌,在权力的宝座上所演出的私欲膨胀和人性迷失的悲剧,以及黎可夫、何人杰随着历史变迁而发生的心灵变迁或命运变迁。而作家对所有这些,依然不做简单的、传统的顺时针处理,而是将它们大胆地置于1987年秋天某日天空出现日环食这一很短的时间内,然后从霍、黎、何三人不同的主体思绪和心理线索出发,展开既多头

多向、又纵横交错的描写，精心编织自由而缜密的时空网。作家这一番煞费苦心的结果，便是一方面扩大了作品和人物的审美含量，一方面酿成了本卷特有的由“日环食”到心被“蚀”的象征意义。该书第三部《生与死》重在展示三位主人公的生命归宿。从这一要旨出发，作家把他们去世的时间放在1998年9月的同一个夜晚。在此基础上，让三个人物立足于各自的空间背景，分别放出原色有异、意蕴不一的心灵之河。这三条心河或曲折回旋，或左右交叉，或扭结前行，最终汇聚为汪洋恣肆、异象纷呈的生命空间，进而把人物面对死神时的灵魂颤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发人深思。毫无疑问，如此这般的艺术努力，为文坛如何正确有效地借鉴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的滋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照。

第四，在具体的语言表达方面，《幻化》亦有着属于自己的鲜明特色。这就是：它既不像某些乡土小说那样，总喜欢通过化用活用方言土语，来强化语言的地域色彩，也不像有的新潮小说那样，更善于凭借语言的陌生化以造成叙述的感官冲击，甚至不像迄今影响不衰的“新写实”小说那样，每每让作家退出作品，让语言保持一种情感上的“零度状态”，而是坚持以自己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构思为先导，把一种经过作家精心修饰的畅达而细腻的现代书面语言作为叙事的基本形态，同时注入强烈的主体韵致和情感评价，由此使文本蒸腾起浓郁的抒情气息和充盈的诗化氛围。应当看到，这样一种语体营造在长篇小说中是颇为不易的。它需要作家具备饱满的创作激情、鲜活的诗性感觉，以及灵动神奇的艺术想象。而这一切一旦同作品中蛰伏了相应因素的人物，情节、场景相融合，便会形成一种独特而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和征服力。我们今天读《幻化》，总有一种在交响诗的境界里漫游的感觉，其原因或许就在这里。显然，此乃作品又一突出